

东亚经纬

2023年第3期

【本期要目】

◆观察与思考.....	1
《教育世界》的主要日文译者（吕顺长）.....	1
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探析（安成日）.....	6
韩国文化产业核心领域的培养（安成浩）.....	10
韩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策略简析（尹虎）.....	16
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的时代趋势（付丹丹）.....	20
◆学术动态.....	24
◆征稿启事.....	29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2023年9月30日

《教育世界》的主要日文译者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吕顺长

一

《教育世界》由罗振玉于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1901年5月)创办,是我国最早以介绍国内外教育动态、教育学说及教育法规条例等为主旨的教育刊物。该杂志为半月刊,至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1909年1月)停刊,持续近7年,累计发行166期。《教育世界》前期(第1-68期),其体例完全仿照《农学报》,后期设有“文篇”和“译篇”两大栏目,“文篇”多为罗振玉本人撰写,“译篇”则大多译自日本的教育法规及条例。光绪三十年(1904年)正月第69期始,《教育世界》事实上改由王国维全面负责编辑工作,并对办刊宗旨、栏目构成、刊载内容乃至板式等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调整后的《教育世界》,其办刊宗旨为:“一引诸家精理微言,以供研究;二载各国良法宏规,以资则效;三录名人嘉言懿行,以示激劝。若夫浅薄之政论,一家之私言,与一切无关教育者,概弗录。”在栏目构成上,由原来的“文篇”和“译篇”扩充至插画、论说、学理、教授训练、学制、传记、小说、丛谈、本国学事、外国学事、杂录、来稿、文牍等。在样式上,由原来的线装改为洋装,并大幅度增加了刊物的容量。

《教育世界》创办之初,罗振玉等考虑到当时中国的近代教育刚刚起步,人们对它的认识尚有待提高,因此提出“与其武断之议论,不如直译外籍,供人采择,尚不致贻误后来”。然而,随着清末新政的推行,派遣留学生、兴办学堂、制定学堂章程、废除八股并逐渐取消科举考试等一系列教育改革逐渐深入,人们对近代教育的认识才不断提高。

在此背景下,《教育世界》适时调整了栏目构成及刊载内容,在增加自编撰作品的同时,译介重点也由单纯的教育法规条例逐步转向西方近代教育理论和著名教育家的思想学说。《教育世界》的这一调整,改变了原来主要通过翻译直接介绍外国教育法规条例的格调,开始将教育融入整个文化学术的大背景中加以研究考察。

二

《教育世界》的译文，既有署名者所译，也有未署名者所译而成。以由“文篇”和“译篇”两大部分构成的第1-68期为例，其“译篇”注明译者的有第1、3、33期(樊炳清译)、第2期(胡钧译)、第4、10、12期(高风谦译)、第5-9期(陈毅译)、第17、18期(沈绂译)、第31、32、39、41期(汪有龄译)，其余第13-16、19-30、34、36期均未署名译者。

这些未署名译文的译者究竟是谁，现在已很难得出明确结论。但据笔者推断，其中有一部分很可能是藤田丰八所译。因为藤田丰八自1897年来到上海后，受罗振玉邀请任上海农学会翻译，《农学报》自创办至第162期译自日文的文章几乎均由他所译，数量达420篇之多。1898年上海东文学社创办后，他在继续从事翻译的同时，还全面主持东文学社的教学工作。1900年，因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加之东文学社的停办，藤田曾一度回国。1901年，他再次受罗振玉的邀请来到中国，在继续参与农学会工作的同时，还就任《教育世界》编辑顾问、江苏师范学堂教习、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总教习等，长期跟随罗振玉从事刊物的编辑发行和教学工作。藤田丰八在担任《教育世界》编辑顾问等工作的同时，很可能还承担了部分翻译任务。

另外，从同为教育世界社所译印的《教育丛书》旧第1-3集来看，为该丛书提供译稿的有沈绂、王国维、周家树、汪有龄、郑守箴、中村大来、中岛端、吉村寅太郎、罗振常、周维新、小侯规义等人。限于篇幅，以下着重对樊炳清、沈绂、汪有龄、高风谦、陈毅、胡钧等人的日语学习经历及相关事迹作一考察。

三

樊炳清(1877-1929)，字少泉，一字抗父，曾用笔名志厚等，浙江山阴县(今绍兴)人。1898年入上海东文学社随藤田丰八等习日文、英文及其他学科，同学者有王国维、沈纮、陈贻范等，其中王、樊、沈三人尤受罗振玉器重。罗振玉在《集蓼篇》中称：“学社创于戊戌仲夏，及八月，政变发生，校费无出，……生徒散者三之一。而高材生若海宁王忠愬公，山阴樊少泉炳清、桐乡沈听伯纮两文学，均笃学力行，拔于侪类之中，不忍令其中辍，乃复由予举私债充校费”。

樊炳清从东文学社肄业后，长期跟随罗振玉从事《农学报》、《教育世界》以及湖北农务学堂、江苏师范学堂的翻译工作。虽然也有研究者认为，樊曾留学日本，但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尚未确认其是否属实。1906年罗振玉辞去江苏师范学堂监督之职，被举荐入学部任行走，樊炳清与王国维一起随罗振玉入学部，任图书局《学部官报》编辑等职。辛亥革命后，罗振玉与王国维东渡日本，樊炳清接受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的邀请，任该馆编译所编辑。

纵观樊炳清一生所从事的事业，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翻译了大量的日文书籍和文章。据统

计，樊炳清于 1899 年至 1903 年间所译的日本书籍就在 30 本以上。如《东洋史要》（桑原鹭藏原著）、《西洋史要》（小川银次郎著、与萨端合译）、《伦理学教科书》、《普通动物学》（五岛清太郎著）、《中等植物教科书》（松村任三、斋田功太郎著）等。

四

沈绒，生年不详，字听伯，浙江桐乡县人。1898 年入东文学社，学习经历与上述樊炳清类似。1904 年受两广总督岑春煊派遣赴法国留学，据当时留欧学生监督呈教育部文，沈绒赴法后“初入中学预备，后入巴黎法科大学，潜心研究，授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又研究理科”。1916 年，本“系预备后年考试理科博士学位，乃竟不幸，猝然病故，以致未能达其所愿”。沈绒的日文翻译活动主要在入东文学社后至赴法留学期间，所译作品多为农学和教育类，且多被收入上海农学会和教育世界社所刊行的各类刊物中，限于篇幅，不一一罗列。有研究者认为，沈绒所翻译的作品不仅涉及领域广泛、内容丰富、质量上乘，而且在选材上非常重视文章和书籍的时效性和实用性。

五

汪有龄(1879-1947)，字子健，浙江钱塘县人。1897 年曾入南洋公学师范班，不久退学。同年 12 月与嵇侃作为杭州蚕学馆学生被派往日本留学，先入大阪梅清处塾随山本宪习日文，1898 年 4 月又入琦玉县的蚕业学校“竞进社”。1898 年 9 月，汪有龄因近视不宜习蚕等原因被允许改学其他专业，进入东京一家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创办的预备校—日华学堂，并打算从此校毕业后升入第一高等学校，进而升入大学攻读法律。但遗憾的是，因健康原因，他后来仅在日华学堂学习一年，于 1899 年 10 月不得不放弃留学回国。时人认为，“岁丁酉已有官派学生嵇君伟、汪君有龄二人到东学蚕业，汪君以病早回国，嵇君于辛丑年夏卒業回国，是为中国官派学生至日本之滥觞”。

有关汪有龄的留日经历，目前大多论著均认为其最终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据笔者管见，此说最先见于《汪康年师友书札》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附录《汪康年师友各家小传》中有关汪有龄的部分，笔者在以往的论文中也曾加以引用。但目前看来，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很难证实汪因病回国后再次赴日留学。1903 年 4 月，汪有龄在给山本宪的信中称：“有龄昔游贵国，誓欲学成而归，半途因病辍业，实乖素愿。近且低首下心为湖北农务局译人，沾辱门墙至斯已极。”由此观之，汪从日本回国后的最初数年，主要担任湖北农务局翻译，同时还为

罗振玉所创的刊物提供译稿，至少在 1903 年前未再次留学日本。

1906 年春，原《商务报》改为《商务官报》并加以扩充，由商部主事章宗祥任主编，汪有龄任编辑兼撰稿人。同年 9 月，汪进入修订法律馆，主要从事外国法律书籍和文章的翻译工作。同年末，京师法律学堂创办，隶属修订法律馆，汪有龄被聘为教员，专门担任日本教习授课时的口译工作。冈田朝太郎、松冈正义等日本专家的授课内容经汪有龄口译后，还被熊元翰等编辑整理成《京师法律学堂笔记》印行。而在 1903—1907 年间，他还翻译出版了《日本议会史》（工藤武重著，通州翰墨林书局，1904，1905 年）等书籍，至于此数年间汪有龄是否曾再次留学日本，目前尚无可靠原始资料得以佐证。

六

陈毅(1873-?)，字士可，湖北黄陂县人。胡钧(1869—1944)，字千之，湖北沔阳县人。有关此二人的赴日经历，朱颖认为：“1899 年至 1900 年，尚在两湖书院任教的陈毅奉张之洞之命，赴日本考查教育及行政情况”，陆胤也认为：“1899 年张之洞派遣两湖书院的高才生陈毅、胡钧等赴日”，但两者均未注明出处。而 1901 年罗振玉赴日考察教育时，陈毅和胡钧两人均随同前往，此为人所熟知，不再赘述。有人还认为，陈毅和胡钧在任自强学堂教习前曾出国留学，如《武汉大学百年校史考》一文称“自强学堂聘请了留学归来的陈毅、胡钧等任教”。

文章中虽然没有具体指出他们所留学的国家，但笔者推测留学日本的可能性较大。根据有关资料显示，陈毅后来的确留学日本，并于 1910 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政治经济科，但其赴日时间应远在 1901 年后。笔者查阅了 1901 年前有关留日学生的原始资料，并未发现陈毅、胡钧两人的留学记录。鉴于 1901 年前的留日学生人数还比较少，在这一时期留日的学生大多都能找到其线索，因此可以初步认为这两人在 1901 年前留学日本的可能性较小。那么，他们两人最初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学习并掌握日文的呢？这也许可以从高凤谦身上得到一些启示。

七

高凤谦(1869—1936)，号梦旦，福建长乐人。自 1895 年入杭州知府林启幕府以来，除参与创办求是书院并于 1901 年任浙江大学堂总教习等职外，还曾于 1902 年率学生东渡日本并任浙江留日学生监督，至 1902 年 12 月辞去监督之职回国，滞留日本一年有余。回国后，适逢商务印书馆设立编译所，受张元济邀请任编译所国文部部长，主持教科书的编辑。1905 年 12 月，出洋考察政治大臣端方和戴鸿慈等赴日本考察，高凤谦与高而谦、魏子京、周宏业等人作为随员

赴日。如上所述，高风谦于 1902 年后有数次赴日并较长时间停留日本的经历，但他在 1901 年就已开始为《教育世界》翻译日文稿件，说明在此之前曾学习过日文并具备翻译能力。目前，在有关高风谦的研究中，荫山雅博曾提到他可能曾进入东文学社学习，但未注明出处。除此之外未见记载有 1901 年留学日本或就读于国内日文学校的相关内容。

八

经查找，笔者终于发现了有关他开始学习日文的如下线索：“东文与汉文相近，弟久已知之。惟欲学东文有何简法？只求能通其文，不必习其方言。若有简便之书，无用口授者，乞代购一二册。若必须口授，以年岁稍大之人，记性不甚好者，日学三四点，约须几时始能读书阅报，亦祈详示。生当斯世，不通他国之文，不能成学。自揣拙鲁，西文万不能成，若东文则思从事，故欲闻其略也，想足下必不吝教之。足下与日人朝夕相处，曾否兼习东文，亦一示之。九月念八日。”

此系 1897 年 10 月 23 日高风谦致《时务报》经理汪康年书简之部分内容。由此观之，高风谦是在痛感学习外语之必要后，于 1897 年 10 月后开始学习日文，而其学习方式，很可能就是书信中所提到的自学或单独请人口授。

由于当时国内的日文学校还非常少，而在部分风气较开放的地区，像高风谦那样，较早接触到新学的部分人士已深感学习外语的必要，自学或向周围为数极少的会日文者（来华日人等）请教便是其重要手段。

再回看陈毅和胡钧，两人早年入两湖书院，后作为张之洞的幕僚并深受其器重，也属于较早接触新学的开明人士，其周围又不乏来华任教的日本教习，具备了在较早时期开始以自学为主学习日文的条件。因此，他们二人的日语学习经历很可能与高风谦相仿。

上述《教育世界》六名翻译者，或早年留学日本，或就学于国内的东文学堂，或自学，或向他人请教，通过各种方式学习掌握日文。加之他们都有非常深厚的国学基础，又都较早开始接触近代西洋学问，这些都是他们翻译日文的有利条件。因此，在《教育世界》创办后，他们成为了该杂志的主要日文翻译成员。

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探析

黑龙江大学人文学院 安成日

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国从不同视角、领域和层面制定并实施了类型多样的区域政策，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区域政策体系。现行区域政策基本遵循“量体裁衣”原则，大多政策是“因地因时制宜”的变体与混合/大多政策既有“因地因时制宜”的变体。而且，政策实施的地域单元既有面积广阔的区域如西部地区，也有各种类型区，地域范围变化之大。各种区域规划在空间、内容、功能上高度重叠，有的还配有相关政策，导致区域政策负担过重。许多政策措施都是依据意见、战略、规划而来，有不少带有一对一的性质，缺乏统一的规范和标准，政策“碎片化”现象严重。这种“碎片化”容易导致各地方政府相互竞争和攀比，使一些政策在实施中逐渐泛化，由此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例如，经过多次比照实施、参照实施等，目前享受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因此，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形势下，应按照政策精细化、措施精准化的要求，重构国家区域政策的基本框架，以类型区为基本依据，构建全国统一规范、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体系。

一、建立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体系

为激发地区经济活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高政策的有效性、精准性和可持续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探索出了按照经济功能区、主体功能区和特殊类型区，实行区别对待的差别化区域政策。这种差别化的区域政策，较好地体现了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有利于提高政策的实施效果。从国际经验看，各国的区域政策大都针对落后地区、萧条地区、膨胀地区等问题区域展开。据此，有学者主张中国的区域治理应聚焦问题区域，并按照“穷堵老”即落后地区治“穷”、萧条地区治“老”、膨胀地区治“堵”的思路来设计类型区政策。也有学者主张按照问题区、功能区、政治区三种类型区来重塑国家区域政策。考虑到政策的延续性，未来重塑国家区域政策应立足构建统一国内大市场，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进一步完善类型区政策，着力增强政策的规范性，缩小政策地域单元，提高政策精准性和有效性。

一是弱化经济功能区的优惠政策。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针对不同类型经济功能区，如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均实行了相应的优惠政策。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国家应逐步弱化对各类经济功能区的优惠政策，重点鼓励其进行体制机制创新，获取改

革和开放红利，推动政府支持从政策优惠走向体制创新和制度型开放。

二是细化主体功能区的调控政策。为规范和优化国土保护开发格局，国家对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等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实行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中央财政自 2008 年起设立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2022 年达到 881.9 亿元。全国国土空间规划按其主体功能进一步将国土空间划分为城镇空间、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未来应进一步细化主体功能区类型，如区分不同类型的农业空间，尤其是粮食主产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并将政策地域单元由县级行政区缩小到乡镇、村庄甚至地块，以提高区域政策的精准性。

三是加强特殊类型区的援助政策。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困难地区统称为“特殊类型地区”。2022 年，国务院批复了《“十四五”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规划》，涉及欠发达地区、革命老区、边境地区、生态退化地区、资源型地区、老工业城市等六类区域。很明显，革命老区和民族地区并非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典型问题区域。未来国家对特殊类型区的援助政策应逐步转变为对关键问题区域的援助政策。为此，应研究确立关键问题区域的标准、类型划分和政策工具组合，切实帮助那些面临严重困难且自身无法解决、需要中央给予援助的关键问题区域，及时解决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对于革命老区和民族地区，要实行同等优先。

四是区分国家战略规划和区域政策。战略规划是长远性、全局性、综合性的总体谋划和宏伟蓝图，现行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中的四大区域以及区域重大战略中的“三区两流域”均属于战略规划的地域单元。为保障战略规划的有效实施，国家配套的相关政策应依托并纳入前述的类型区政策中，而不能以战略规划区域作为政策实施的地域单元。为此，应按照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对现行的四大区域政策以及各区域重大战略的规划配套政策进行相应调整，以逐步形成全国统一规范、分类管理的差别化区域政策体系。

二、研究制定欠发达地区发展政策

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国家设置 5 年的过渡期，对脱贫地区继续给予相应支持，保持现有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原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调整为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相关工作，2022 年该资金总规模达到 1650 亿元，比 2020 年增长 12.9%。随着 2025 年过渡期的结束，脱贫地区政策需要及时转向欠发达地区政策。欠发达地区与脱贫地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看，脱贫地区政策不能长期固化，更不能以此取代欠发达地区政策。经过多年的扶持，全国 832 个脱贫县已经出现了分化特征，而有些非脱贫县因长期缺乏政策支持正面临诸多困难，其发展水平已经低于某些脱贫县。在“十四五”后期，应根据情况变化和共

同富裕目标，将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提上重要议程，尽快研究制定欠发达地区发展政策，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支持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

首先，要研究制定欠发达地区的标准。当前，可以考虑根据低收入人口集聚以及地区发展能力和水平等因素，精准识别和划定欠发达地区。根据以往的经验，宜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综合考虑低收入人口规模和比重、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居民人均收入、人均财政收入和财政收支缺口等指标，将全国排名靠后的一定比例区域纳入欠发达地区范畴，并在综合评估的基础上以5年为期进行动态调整。

其次，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要围绕立足新发展阶段、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尽快研究制定新时期国家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的相关政策，在财政、税收、金融、项目投资、产业发展、人才培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帮助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使这些地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不至于落伍、掉队，为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三，对老少边地区实行同等优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老少边地区实施了一系列援助政策，帮助其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在国家政策支持下，老少边地区经济社会近年来获得了快速发展。未来要继续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着力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断增强其内生发展能力；同时，要进一步加强边疆地区建设，大力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促进边疆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对于属于“老少边”的欠发达地区，可以适当放宽入选标准，并在投资和政策支持上给予适度倾斜。

第四，实施欠发达地区创新驱动行动。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指出：“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欠发达地区而言，要实现跨越赶超和内生发展，将需要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可以说，创新是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赶超和内生发展的根本动力。然而，由于基础薄弱和创新资源缺乏，除了依靠自身努力，欠发达地区提升创新能力还需要中央和发达地区的支持。可以考虑在国家层面实施欠发达地区创新驱动行动计划，国家有关部门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予相应支持，同时引导和动员中央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发达地区政府、民营企业和社会组织等，采取多种多样形式，支持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品牌创新，依靠创新驱动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

三、提高区域政策的精细化程度

区域政策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全域共富的政策工具组合。提高区域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仅要缩小政策实施的地域单元，实行分类管理的差别化政策，而且要统筹区域政策的多元化目标，综合运用各类区域政策措施，采取多样化的区域政策手段和工具。

首先，统筹区域政策的多元化目标。过去在论及区域政策的目标时，更多考虑的是效率与公平的抉择。这主要是就区域援助政策而言的。事实上，中国区域政策的内涵十分广泛，除了要考虑效率与公平目标外，还需要考虑安全和可持续性目标。不同类型的区域政策，其目标取向也不尽相同。比如，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经济功能区的选择，更多考虑的是经济效率目标；而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政策，主要是考虑公平目标。除此以外，对老少边地区的支持政策也体现了安全目标，如维护国防安全、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等；而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粮食主产区的补偿政策，则兼顾了安全和可持续性目标，二者不仅是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而且有利于促进可持续发展。

其次，发挥各类政策的合力效应。从政策的功能看，区域政策可分为激励性政策、限制性或约束性政策、补偿性政策和援助性政策四种类型。激励性政策是正向鼓励的支持政策，在中国各类区域政策中广泛使用。限制性政策主要在大都市膨胀区、生态功能区和粮食主产区等使用，如为疏解非首都功能，北京市颁布了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并进行了多次修订完善；生态环境部已将超过 25%的国土面积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禁止在区域内进行工业化和城镇化开发。国家对欠发达地区以及其他面临困难地区的支持政策带有援助性质，属于区域援助政策的范畴。区域补偿政策则是对特定区域因承担国家功能而做出牺牲的一种利益补偿，区域生态补偿、资源补偿和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等都属于此类。在新形势下，应根据不同区域承担的功能和面临问题的性质，将四类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合力效应。

第三，实行多样化的政策工具组合。在早期，为刺激各种经济功能区发展，政府更多采取政策优惠尤其是税收优惠的办法，既造成地区间不公平竞争，也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区域政策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建立在有效市场的基础之上，在维护公平竞争和有利于形成统一市场的大框架下，采取多样化的政策工具组合，充分挖掘组合政策的集成效应。即使是对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也不能只靠政府拉郎配，而应遵循市场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完善相关制度安排和利益分配机制，在合作共建中实现互利共赢。

韩国文化产业核心领域的培养

浙江大学韩国学研究所 安成浩

自 1998 年韩国提出“文化立国”战略至今，在政府和民间的不懈努力之下，韩国文化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不断迈向国际市场。被着重培养的电影、电视剧、音乐以及电子竞技等产业成为代表韩国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并风靡全球，成为继三星电子、现代汽车等经济因素之后，提升韩国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

一、电影产业

韩国电影诞生于 1919 年，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的电影产业逐渐成长，并取得了良好的票房成绩。随着 1987 年电影市场的开放，韩国电影从政治宣传工具向电影产业转化，政府开始意识到振兴电影产业的重要性，后续的领导人不断在振兴电影产业的政策上探索。20 世纪 90 年代，金泳三政府把发展电影产业作为经济政策的一环予以推进，改变以往电影事业的政府控制模式，转向振兴模式；金大中政府在“支援但不干涉”的基调下，实施了培养韩国电影产业的政策；卢武铉政府延续振兴电影产业计划的同时，把重点放在了扩大多样性和公共性上；文在寅政府则更致力于对多样性电影、被疏远的电影产业从事者的支援。韩国政府从法律政策、资金援助等方面给予电影产业积极有力的支持，相继实施了取消电影审查，实行分级制度、设立电影基金扶助电影发展，激活投资环境，组建电影振兴委员会等措施，为韩国电影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由此可见，韩国电影的崛起与政府对电影产业的政策支持密不可分。政府实施的合理电影产业政策，是维持本国电影健康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对电影人创作力的激发、多元化电影市场的形成，以及本土电影与国际的接轨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了促进韩国电影工业的发展，挖掘新人新作，推动南北韩文化交流，为亚洲电影走向世界提供更广阔的平台，韩国于 1996 年开始举办釜山电影节。在四届影展之后，釜山电影节迅速发展壮大，俨然成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电影节，并吸引了全球电影人的目光与关注。除此之外，韩国还有另外两个运作比较成功的电影节：富川国际奇幻电影节、全州国际电影节，通过电影节打造城市品牌，进而提高国际形象，对韩国电影走向世界、进军海外提供了交流平台，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许多国际学者认为，韩国电影业是世界上最具创新的产业之一。自从轰动一时的动作片《生死谍变》（1999）超过好莱坞超级大片《泰坦尼克号》（1997）的票房，在韩国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之后，一大群创意从业者和企业已经改变了韩国全球媒体和数字文化产业，并在本国和国际观众中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他们的努力已经产生了代表韩国声音并引起强烈共鸣的创作内容，从而打开了韩国文化表达的新空间。

21 世纪以来，《共同警备区》、《杀人回忆》、《老男孩》、《亲切的金子》、《汉江怪物》、《燃烧》、《寄生虫》等电影先后在戛纳、墨尔本、柏林、威尼斯等电影节上获得提名或大奖。2020 年 2 月，电影《寄生虫》包揽了第 92 届奥斯卡奖的四项重要奖项，并成为史上第一部非英语最佳国际影片。

北京电影学院发布的《全球电影产业报告 2018》显示，2012 年至 2016 年，韩国电影产业综合指数连续 5 年稳居世界第三，跻身世界电影强国之列。中国电影产业综合指数虽稳中有进，但始终不敌韩国在世界电影产业中的排名。

二、电视剧产业

20 世纪末，韩国电视产业异军突起，每年基本都会有国内收视率突破 40% 的“国民剧”。韩剧不仅受到国内市场的欢迎，在亚洲邻国例如中国、日本、泰国等地也取得了高收视率的成绩。21 世纪初期最具有代表性的韩剧《大长今》在中国播放时，创下了很多收视纪录：在中国大陆，收视率是以往同时段收视率的两倍；在中国香港，《大长今》全剧最高收视率为 50%，收看观众多达 321 万，几乎为香港人数的一半；在中国台湾，《大长今》一举打破台湾韩剧收视率不景气的局面，收获有线电视收视率第一的成绩。

韩国把文化产品的出口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来对待，提出了“瞄准亚洲市场”的口号，对文化产品的出口产业进行援助、奖励。政府积极扶持电视剧制作商尤其是独立制作商，为其设立专项基金扶持，依据韩国《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政府设置文化振兴基金，同时针对韩国三家电视台（KBS、MBC、SBS）垄断韩剧制播的状况，采用节目配额制度，保证独立制作商作品播出平台的同时，保障了独立制作商的市场以及经济利益；其次在人才层面，集中体现在编剧人才，优裕的酬劳待遇、制播一体的产制模式，将编剧置于剧目拍摄的中心地位。同时，政府还创立故事创新中心，由国家层面支持和鼓励创意故事，为韩国电视剧故事素材、剧情深度提供有力支撑。此外，韩国政府在 2001 年起先后在日本东京、中国北京、美国洛杉矶、英国伦敦成立海外办事处，用以沟通和帮助开拓韩国电视剧海外市场，并且还通过财税优惠政策激励韩国电视剧产业走出国门。

韩国电视剧在亚洲乃至国际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不仅促使韩国广播放送产业与其他国家进行广泛交流，海外共同制作也逐渐增多，还使得相当一部分的韩国演员开始出演其他国家的电视剧。如：蔡琳、秋瓷炫、张娜拉等是最早一批在荧屏与中国观众见面的韩国明星，《康熙秘史》、《木府风云》、《刁蛮公主》等剧几乎是家喻户晓。之后有郑智薰（《克拉恋人》）、林允儿（《武神赵子龙》）、郑秀晶（《毕业季》）等韩国艺人先后参与中韩合拍电视剧。

2016年，Netflix公司进军韩国市场，除通过购买韩国知名制作公司和电视台的内容版权、合作开发视频内容外，Netflix继续保持大制作的自制内容生产方式。2021年10月12日，Netflix公司宣布，该公司投资的韩国电视剧《鱿鱼游戏》在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日播放量登顶，成为其史上开播播放量最高的剧集，特别是其引发了欧美等影视工业相对成熟的市场热潮，进而重新激活了因《寄生虫》获奥斯卡奖而带起的对韩国文化的讨论热度，也为韩国电视剧的发展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三、音乐产业

韩国的人口数量少，国内音乐市场需求量有限，因此韩国音乐产业不仅仅局限于本土化发展，而是以开拓国际市场作为音乐产业发展的立足点，把具有韩国特色的本土文化加以创新，凭借新的技术和传播渠道推动韩国音乐产业不断向海外扩张，音乐风格也愈加国际化，从而使韩国音乐迅速风靡全球。

1998年后，韩国政府将目光投向了流行音乐产业，明确提出要借鉴美国和日本等流行音乐产业模式，打造韩国版“格莱美奖”。各届韩国政府先后成立“韩流支援政策协会”、“韩流文化振兴团”、“韩流支援协力科”等，以保障韩国流行音乐产业的发展。同时，有远识的演艺企划公司借助1997年经济危机之后韩国音乐产业的洗牌和重构机会，在资本市场中通过风险投资获取资金，利用当时飞速发展的现代网络和信息技术，采用一种称为“文化技术”（Culture Technology，简称CT）的方法进行K-Pop业务的变革性管理。这个方法最初由SM娱乐公司创始人李秀满提出，即模仿西方好莱坞工作室的造星方法，在企业规模、组织架构、和艺人的合同关系以及对其私生活的控制等方面构建一套独有的体系。

2008年，YouTube进入韩国市场，韩国音乐才开始通过网络真正向西方市场进行全面渗透。同年，韩国组合Wonder Girls凭借歌曲《Nobody》开始在美国市场崭露头角，紧接着，少女时代从2009年的《Gee》到2011年的《The Boys》，在美国市场收获不俗反响，韩国音乐在美国市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的数据显示，2009年韩国音乐全球产值达到3亿美元，较YouTube正式进入韩国的2008年翻了一倍。2013年，少女时代凭借《I Got A Boy》战胜了受欢迎的Lady Gaga、One Direction、Miley Cyrus，获得了YouTube音乐奖的年度音乐

录影带奖，震惊了全球音乐产业。随着被评为“近二十年来韩国流行音乐中最重要的歌”——《江南 Style》的爆红，继而在国际上也掀起了一股热潮，该 MV 很快点击率突破 10 亿次，截至 2022 年 7 月，《江南 Style》在 YouTube 上的点击率超过 44 亿次。通过网络，韩国流行音乐超越地区限制，成为全球性的文化现象。美国 CNN 曾写过一篇名为《江南 Style 的 10 年：Psy 的热门歌曲是如何向世界宣传韩国文化的》的报道，乔治梅森大学教授 Kyu Tag Lee 在采访中表示，YouTube 等具有扩散性的媒体平台对于韩国文化的宣传功不可没。从 YouTube 是 K-POP MV 的主要传输渠道这一点来看，从侧面反映并证明了 K-POP 作为“观看的音乐”这一特点与它享有全球人气这一事实。

2018 年，凭借正规三辑《LOVE YOURSELF 轉 'Tear'》，防弹少年团（BTS）荣登美国“Billboard200”专辑榜的榜首，以一张全韩文的专辑，打破了文化与语言的藩篱，创下韩国流行音乐史上专辑榜巅峰。2019 年，防弹少年团举办了 33 场海外巡回演唱会，巡演票房累计排名全球艺人第二名，是前 10 名中唯一一个韩国团体，仅在美国“玫瑰碗”体育场就获得了 1660 万美元的收益，不仅在亚洲偶像团体中独一无二，更是超越了如泰勒·斯威夫特、U2 等西方流行乐偶像和乐队的记录。2020 年 1 月，防弹少年团受邀参加第 62 届格莱美奖颁奖典礼，并在颁奖典礼上与其他欧美知名艺人共同合作带来了精彩表演。这是该组合继 2019 年首次作为韩国歌手担任格莱美颁奖嘉宾之后，再一次作为韩国歌手第二次登上格莱美舞台进行表演。至此，防弹少年团也创下了在美国 3 大音乐颁奖礼 BBMA、AMAs、格莱美都带来公演的纪录，书写了 K-pop 新的历史。随后防弹少年团发行的正规四辑《MAP OF THE SOUL : 7》，首日成绩便高达 265 万张，凭借这张专辑，防弹少年团第 4 次登顶“Billboard200”榜首，成为继披头士乐队保持约 1 年 5 个月（1966 年 7 月—1968 年 1 月）的纪录之后，首位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 4 张专辑蝉联该榜单第一位的组合。作为一张非英语圈专辑，防弹少年团的新专辑拥有在国际范围内传播韩国流行文化的划时代意义。数不胜数的荣誉体现了防弹少年团巨大的国际影响力，也从侧面反映出韩流文化在国际上传播的明显态势。

随着韩国流行音乐产业国际化发展的趋势，韩国组合的宣传推广渠道也逐渐国际化。很多组合通过参与欧美本土知名电视、电台节目，接受欧美知名媒体采访，参与欧美音乐节、颁奖典礼等方式直接进行面向国际的宣传与推广。如防弹少年团曾出演美国知名电视脱口秀《艾伦秀》、出席格莱美音乐颁奖典礼等；BLACKPINK 曾出演《早安美国》节目、科拉切音乐节等；NCT 出演美国《柯登深夜秀》节目等。众多组合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世界巡演，甚至将巡演地图扩大到了与韩国有 13 个小时时差的南美洲，提升了韩国音乐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

在疫情过后，世界各国的演出市场都在逐渐复苏时，韩国音乐产业凭借成熟的娱乐生产体系和经验丰富的演出团队，迅速抢占线下市场，包括但不限于音乐节、剧场、体育馆甚至体育场级别的巡演。众多能提供大量优质表演的韩国现场型组合，将会成为后疫情时代韩流音乐向外输出的主力军。

四、电子竞技产业

在 2022 年杭州亚运会上，电子竞技项目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韩国国防部发布消息称“如果在电子竞技正式项目夺冠，可以判定为艺术体育要员”，而艺术体育要员经过推荐，便可成为兵役特例制度的对象。兵役特例制度虽不能直接免除兵役，但在相应领域进行 34 个月的义务服役，在义务服役期间需进行 544 个小时的志愿服务，也算履行兵役义务。

1997 年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互联网产业被韩国政府列为重点发展产业。1998 年至 2002 年韩国政府共投入 110 亿美元用于发展全国的宽带基础设施建设。随着韩国 Korea Telecom、LG Powercom、Hanaro 等一批互联网运营公司的快速发展与网吧的迅速普及，推动了韩国电竞产业发展至全球价值链核心区域。

通过重整政府、协会、企业间的关系，促进民间投资，韩国随后成立了韩国游戏产业开发院，推行多媒体分级制度等措施，促进了电子竞技产业的快速发展。自 2011 年以来，韩国国民议会一直试图将电竞团体和游戏行业的赞助商与媒体甚至学术界聚集在一起。国民议会随后颁布了与电子竞技相关的特别立法，以促进电子竞技知识体系的发展。

2000 年，韩国政府就已经成立了韩国电子体育协会以支持其发展，现在该协会隶属于韩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并且还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电子竞技的电视台。韩国国会于 2006 年，制定并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专门针对游戏而独立颁布的法律——《游戏产业振兴相关法律》。较为完善的法律和良好的电竞发展规划，给韩国电竞产业带来了稳定、优渥的发展土壤，韩国电竞产业也由此得以迅速发展。韩国政府对电子竞技发展的支持不仅仅体现在对其政策法律的支持上，韩国政府甚至还直接干预电子竞技赛事的举办，比如著名的 WCG 赛事就是由韩国政府直接干预举办的赛事。

2015 年，韩国政府认为现有的龙山电竞馆已经无法满足电子竞技迅速发展的需求，便由政府出资 1400 万美金（约 8600 万人民币），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电竞场馆，由此来推动韩国电子竞技的发展。同时，韩国政府还特别重视如何正确地引导青少年参与电子竞技，早在 1999 年，韩国政府就已经制定了《唱片、录像物及游戏物相关法律》，以官方的身份定义了游戏与其产品以及其行业。韩国还制定了游戏等级审核制度，对游戏内容进行严格的分级管制，防止青少年沉迷于网络游戏。电子竞技产业每年都可以给韩国带来数十亿美元的产值，并且塑造了一批形象健康、收入不菲的职业选手，他们广受人们追捧，所以在韩国总是会有大批年轻人进入电子竞技行业，梦想着成为全民偶像；另一方面，人才充盈也为韩国电竞的持续良好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韩国成为世界上电子竞技发展得最好的国家之一，也离不开学界对电子竞技产业的关注。在 2022 年 12 月举办的“电子竞技教育革新论坛”上，湖南大学校长 Park Sangchul 表示未来社会会发生的其中一个变化便是文化产业逐渐向数字经济转变，并与技术相互融合，这为电子

电竞产业的生长提供了可能性。湖南大学和乌山大学先后于 2020 年和 2022 年在四年制大学中设立电子竞技专业，旨在培养赛事运营、赛事解说、教练、数据分析等电竞专业人才。

五、漫画产业

韩国政府提倡“一源多用（OSMU）”，从而可以创造更多样化的附加值。项目管理模式 OSMU 引入漫画产业可以被解读为“一个创意、跨境产业、不同版本、不同载体”。一个创意主题可以产生许多子项目，包括漫画、动画、游戏、卡通形象产品，甚至可以扩展到周边电影、电视节目、食品等领域。

韩国漫画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 21 世纪初，适应了以网络空间为基础的新变化，迎来了新的时代。韩国网络漫画市场在进入 21 世纪中期之后，开始利用以门户网站为中心的搭载平台，也就有了现在备受欢迎的网络漫画。2020 年“漫画日”这一天，时任总统文在寅戴上了绘有网络漫画人物的口罩，以此表示对韩国漫画的支持。

2022 年上半年，漫画（网络漫画、出版）文化产业出口额同比增长 28%，达到约 5600 万美元。在 2021 年的海外韩流现状调查中，网络漫画在韩国文化内容消费中的比重排在第 6 位（27.0%），2022 年为 28.6%，排名第一。网络漫画的好感度为 73.6%，超过了全部 11 个内容的平均值（72.5%），在与新冠疫情发生前相比的消费量变化的问卷调查中显示，受访者回答消费量增加的比重也接近 50%（49.9%），从侧面反映了韩国网络漫画全球人气的增长趋势。

随着包括 NAVER 网络漫画、Kakao 娱乐等大型企业在内的网络漫画平台开始扩大北美、欧洲、日本等全球网络漫画市场，韩国漫画也越来越受到全球关注。基于原创网络漫画和小说知识产权（IP）扩展为文化内容产品从而提高收益，这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把漫画制作成电视剧、电影、综艺等。当前韩国动漫产业的目标是把人气有保证的网络漫画与此前从未尝试过的影像类型相结合，推出差别化的内容，重新解读原创故事 IP，通过世界观扩张的成功案例构建 IP 价值链，从而提升韩国动漫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韩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策略简析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所 尹 虎

2022年11月，韩国政府决定向包括芯片和电动汽车在内的关键技术领域投入550万亿韩元（约合4220亿美元），三星电子、SK海力士等的韩国大企业加入了一项政府计划，可以说这是韩国迄今为止最积极的关键技术投资计划。韩国政府表示，将在芯片、电池、机器人、电动汽车和生物技术等领域投资数十亿美元。该蓝图包括创建可容纳巨型工厂的半导体制造中心，包括设计工厂和材料供应商，以加强韩国自己的供应链。

一、韩国半导体产业危机

在半导体领域，韩国一直处于全球领先地位，2021年三星和SK海力士半导体营收排名分别位列于全球第一和第三。但随着近年来下游市场的变化，作为韩国支柱性半导体产业的存储芯片市场景气程度正在逐渐下滑，韩国半导体产业正面临着生产链和国际复杂政治形势的双重困境。

存储芯片市场不景气是韩国半导体产业整体下滑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三星和SK海力士两大头部厂商的业绩变化上。根据SK海力士近五年的业绩变化，可以看出SK逐年增长的净利润在2022年遭遇断崖式下降，暴跌75%，业绩可以说是非常惨淡。而市场的大环境使SK不得不降低DRAM和NAND芯片产品的价格，从而保证了其营业总收入的增长趋势。业内分析师预计SK海力士在2023年前两个季度将持续目前亏损的境况。

相比于只专注于存储领域的SK海力士，三星电子境况稍好些，三星对旗下半导体业务提前进行调整，使代工业务在2022年第4季度达到7.0164万韩元，已超NAND业务，接近DRAM业务。代工业务与存储芯片业务的盈亏互补使其整体盈利水平仍呈现上升趋势，并且营业总收入继续创历史新高。但是进入2023年，存储芯片市场收缩的大趋势依旧势不可当，三星电子在2023年第一季度预计亏损4万亿韩元。

二、韩国半导体产业背后的“辛酸”

从韩国的两大头部半导体厂商的境况可以看出韩国半导体产业整体呈现持续下滑趋势，这才有了文章开头韩国政府对半导体产业的巨额投资。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半导体强国当下境况如此窘迫？

(1) 存储芯片下游市场收缩

消费电子作为存储芯片最大的下游市场，近一年来全球消费电子市场疲软，而各厂商芯片产能远远大于终端需求导致芯片库存积压，DRAM 和 NAND 芯片价格暴跌幅度超 50%，并呈现持续下行趋势。

(2) 上游原材料受日本限制

韩国高度依赖日本的半导体原料。有数据表明，2019 年韩国从日本企业进口的氟化氢占 44%，光刻胶更是高达 92%。但在 2019 年 7 月，由于日韩两国政治因素，日本政府限制对韩出口氟化聚酰亚胺、光刻胶、氟化氢三种关键芯片材料。在此后三年的对峙下，韩国虽一定程度上积极实现国产化替代，但是实现成果有限。在下游库存积压的窘况下，韩国为解决国内半导体产业困境，不得不向日本妥协。

(3) 复杂国际形势的压力

受中美贸易对峙影响，美国一直主导半导体产业大国应该联合对中国实施半导体设备管制，这对韩国来说不是个好信号。要知道，2022 年韩国向中国地区出口的半导体设备占总出口的二分之一，并在近几年对中国出口一直呈下滑趋势，此情况也使韩国半导体设备产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三、发达国家半导体产业的自救

其实除了韩国之外，其他发达国家也陷入了半导体产业的困局之中。随着半导体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其重要性也日益凸显，而新冠疫情的出现暴露了各国半导体产业链的缺陷，使各个国家必须做出相应对策。

(1) 日本

日本半导体产业初期一直跟随美国发展，但是美国一直把握着核心技术，对日本有所防备。而当日本通过自身研发提升核心技术时，美国则对其进行打压，要求日本“半导体技术和市场必须向美国共享”，这使日本半导体发展水平一落千丈。

为了重振日本半导体产业，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加大对本国半导体产业的投资。其中，由丰田汽车和日本电信电话公司等八家企业出资成立新企业“Rapidus”，由政府支持旨在提升日本半导体产业尖端技术，开发 2nm 产品，加强日本在先进半导体领域的竞争力。在半导体领域，日本在过去也有经政府资金扶持的企业案例，但都以失败告终，“Rapidus”是否成功是日本是否能重振半导体产业的关键。

（2）美国

2022 年 8 月，美国颁布了《芯片与科学法案》，目的是使本土芯片制造业回流。要说韩国和日本半导体产业陷入危机是由于技术、原材料与市场等生产链上的问题，那么美国则是由于两方面原因：制造业经济持续萎缩和频繁的出口管制政策。这两个因素导致美国本土半导体企业将设备制造生产线都投资建设到海外来降低成本并规避管制。

根据资料，美国头部半导体生产商应用材料公司、泛林集团和纳斯达克（KLA）的生产厂地都不在美国，而是在以色列、新加坡、奥地利等制造业相对发达的国家。而《芯片与科学法案》就是美国为了解决半导体产业“外流”而制定的，而法案的主要内容则可以简单概括为美国一边通过高额补贴吸引本土半导体厂商在美国本土建厂来重建生产链，另一边利用补贴资格限制半导体企业在重点关注国家（例如中国、俄罗斯）增加产能和设备出口。

2022 年 3 月 23 日，据日本广播协会(NHK)报道，日本经济产业省宣布解除日本对韩国的半导体原材料等 3 项物资的出口限制。日韩长达三年多的对峙最终以韩国的妥协结束，这可能意味着韩国将被迫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芯片联盟”，联手制裁中国半导体行业发展，在产能供应、技术与标准分享、对半导体设备与材料等方面进行封锁，主要限制对中国 14nm 及以下先进制程设备和制造 128 层 3D NAND 所需设备的出口，预计中国芯片产业链将在短期内遭受冲击。

四、韩国的“抉择”

看似美日韩联合起来围堵中国半导体产业，但是对韩国来说未必是件好事，中国市场还是美国技术，韩国面临两难抉择。从半导体设备出口来说，2020 年-2022 年，韩国对中国半导体加工设备出口因疫情原因逐年下降，到 2022 年仅占据总出口的一半，相比 2021 年 1 月，2023 年 1 月韩国半导体设备出口额同比下降 40%。设备出口限制不仅影响韩国在中国的销售额，部分在中国的韩国半导体工厂也会由于设备限制而影响生产。如果未来美国施压韩国加入出口管制，仅从设备出口来看，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

从存储芯片来看，三星和 SK 海力士在中国都有工厂分布，其中三星在中国生产的主要产品是 96 层和 128 层 NAND 闪存，而 SK 海力士则主要生产 12 英寸晶圆的 DRAM 芯片。在美国的《芯

片与科学法案》中，获得联邦资金的公司 10 年之内禁止在中国大幅增产先进制程芯片。像三星和 SK 在中国建厂的半导体企业还有很多，美国政策意在让全世界半导体巨头公司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做出抉择。

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在实行上其实有一定的弊端。半导体厂商要在美国本土建厂需要考虑完整产业链建设所需要的人力、物流、原材料等必要成本因素，显然《法案》中的 500 多亿美元似乎仅能供少数企业进行产业链转移，无法满足中小企业对于美国政策补贴的需求。而从半导体企业长期发展考虑，中国未必不能作为韩国良好的合作对象。从市场规模发展看，中国半导体产业虽起步较晚，但凭借巨大的市场需求，下游应用行业快速发展，使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韩国半导体产业在技术上依赖美国，在设备和原材料上受日本牵制。而中国在半导体设计和内需市场、政策、资金等方面具备优势，设备、材料发展得很快，虽然高端设备发展还需时间，但是以目前中国的发展速度来看指日可待。韩国在存储器、工艺技术、设备材料、企业管理能力具有优势，能为中国在相关领域获取丰富经验。

在比美国和日本发展晚十几年的情况下，韩国用 40 年变成如今的半导体大国，离不开其技术的研发、企业的管理和当地政府的支持，相信韩国目前半导体产业困境只是一时的。韩国半导体企业应在坚固的产业基础之上，加快半导体零部件与设备国产化，拓宽原材料进口来源，才能在未来实现长远而稳固的发展。

中国半导体产业也应向韩国取长补短，学习其半导体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律，加强政府与企业的联合。中韩半导体供应链密不可分，在国际局势复杂的环境下，中韩半导体企业更应坚持合作共赢，减少产业发展风险。

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的时代趋势

浙江工商大学东语学院 付丹丹

实现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因此，深刻认识我国在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中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从新的维度观察和探索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的历史必然性，对于积极推动我国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

一、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的客观性

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从经济发展的维度分析来看，共同富裕不仅要求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个较高水平，而且还要求合理控制与缩小不同群体间的贫困差距，反映了推动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的客观性和现实性。

从共同富裕与改善农村“硬件”和“软件”的客观条件来看，我们认为，共同富裕不仅体现在经济收入的维度方面，还应该体现在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民生事业等方面发展的差距上。因此，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仅靠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不够的。虽然农业农村现代化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但是，目前我国农村生产配套客观条件相对落后。在这种情况下，实施乡村振兴不仅需要市场，还需要农村内部具有可保障的配套生产条件。简单说就是需要“硬件”和“软件”的客观条件。由于目前生产性基础设施的“硬件”相对落后，对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带来许多实际困难。因此，未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就要打造一套产业融合的农村生产经营体系。而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的必要过程，改善农村生产配套的客观条件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从共同富裕与解决农村民生保障短板的客观基础来看，我们认为，目前我国农村民生保障存在短板是一个客观的现实问题。比如说，从农村与城市相比来看，政府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明显不足，这些民生领域的短板将直接导致农村人员流失严重，也对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与城乡居民共同富裕造成障碍。具体表现在：一是生活性基础设施供给不足。近年来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不断提高，但从某些指标来看，生活性基础设施供给仍然存在不足。这也在无形之中给城乡实现共同富裕增加了阻力。二是社会保障安全网络仍需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功能仍然存在着缺陷。虽然“新农合”和“新农保”实施为农村提供了一些基本的社会保障，但是给付水平太低，保障水平十分有限。因此，长期以来农村发展落后于城市，农业经

经济发展落后于非农经济，农民收入低于城市居民的现状并没有明显变化，这些主要是因为城乡要素市场交换的壁垒没有打破、农村的生产能力较为薄弱，以及农村生活条件落后。这是未来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得不改革的问题，也是实现共同富裕不得不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的必然性

从共同富裕与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性来看，我们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共同富裕，都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和具体任务。小康社会是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产物。实现小康社会和共同文明这两个目标的关键都在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不断促进我国社会的全面进步。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两个同步”和“两个提高”。前者分别是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后者分别是实现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的提高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的提高，并着重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意味着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中，更加注重共同富裕。因此，以共同富裕为发展主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寓于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之中，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制定的一系列治国方略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原则，“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共同富裕的要求。

从共同富裕与提高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必然性来看，我们认为，实现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而乡村振兴是必经之路。乡村振兴不仅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而且要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立足于我国国情农情，并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变化和现代化建设规律。所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内涵，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要抓手。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从世界各国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规律看，实施乡村振兴是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和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深入地推进，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明显缩小，农村人力资源和物质要素向非农产业和城市大量转移，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农村发展也相对滞后，甚至出现农村凋敝和衰落现象，这些都暴露出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短板，这些

都阻碍了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当前我国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就成为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战略任务和必然要求。

三、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的历史性

从共同富裕与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历史性来看，我们认为，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一种最简明表述，是中国人民独立之后积极追求的价值和目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意味着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的选择。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入展开和完善，经济总量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生活水平显著上升，先富地区的模板效应带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与此同时，普遍富裕程度不高，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也成为不争的事实，也凸显出一系列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深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共同富裕的实践进程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产生和发展的。所以，我们为了解决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就要求继续深化对共同富裕本质的认识和理解，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继续朝着这一个目标不断前进。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将贫富差距限制在一个合理的，具有激励作用的范围内，是全球各国都没有解决的一个世界性难题。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国家在这个方面也作过一些积极的探索。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1992年确定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后，既通过保证资本的收益以提高积累和鼓励投资，加快经济发展；又增加人民的流动性收入，并将贫富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保证内需和社会的安定。在进入21世纪后，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下，党和政府将消除贫困，缩小收入差距和扩大公共产品供给和均等化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近期目标。

我们认为，当下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必须解决的突出问题。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探索建立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制度与政策体系。并要建立与农民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以此作为各类新型经营主体享受优惠扶持政策的前提，通过保底收入、股份分红、利润返还、品牌溢价收益等方式，推动建立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

共同富裕也是为了解决当前和今后时期的相关问题。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最突出矛盾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中央审时度势提出，在精准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我们要瞄准共同富裕这个目标，解决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不充分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共同富裕本身也是为了解决突出矛盾而提出的一个历史性要求。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精神指引，精神源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坚定成功的信念是激励我们脚踏实地，勇往直前的法宝。由此看来，人民有信仰，脚下才有路；而走好乡村振兴路，农民有信心，脚下才有力量。要用信念筑牢乡村振兴之路。

学术动态

“东方国家现代化道路” 国际论坛在青岛举办

2023年8月26日，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及《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编辑部主办的2023年学术年会暨“东方国家现代化道路”国际论坛在青岛校区举行。本次会议主题为“世界大变局与中国式现代化及东方国家现代化”。来自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郑州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山东大学等40个单位的120余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所长蒋锐教授主持。北京化工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副会长刘贵芹，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王学东，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原副院长范文德，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党工委书记郭培良，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崔桂田在开幕

式上分别致辞，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学术年会和国际论坛，为国内外相关学术机构和学者提供深入交流的平台，共同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及东方国家现代化理论研究，推动科社与共运学科发展。

本次年会暨国际论坛设置三个分论坛进行专题研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专题论坛由陶文昭教授、青岛市委统战部一级巡视员王振海主持，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继文教授点评。与会学者分别就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科学社会主义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创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三种资源及作用、统一战线与中国式现代化、社会革命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政党制度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等问题展开讨论。

“世界大变局与中国式现代化”专题论坛胡振良教授、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所长张淑兰教授主持，山东大学政党研究所所长臧秀玲教授点评。与会学者分别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价值、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古巴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演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的演变、现代化逻辑的转化、“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传统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英国工党的理论与实践、塔吉克斯坦共产党的发展与困境、美国现代化特征以及新时代中国的应对之道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东方国家现代化研究”专题论坛由潘金娥研究员、郭春生教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华教授点评。与会学者就现代化的意涵、东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越南社会现代化的经验与前景、越南共产党现代化理念的探索、越南国家权力配置结构、东亚与拉美现代化道路的比较、哈萨克斯坦现代化的建构、关于俄罗斯现代化进程的认识、中俄（苏）现代化的不同、苏联-俄罗斯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及其启示、苏联新经济政策经验对越南的影响、印度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信息来源：山东大学网站）

“第一届东亚学研究学术研讨会” 在延边大学召开

2023年8月19日至21日，“第一届延边大学东亚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延吉顺利召开。本届会议以“东亚人文学研究的现状及展望”为主题，围绕“东亚文学”“东亚语言学”“东亚

史学”以及“东亚哲学、文化学、国际关系”等四个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开幕式上，延边大学校长蔡红星致开幕词；韩国启明大学李盛焕、鲁东大学亢世勇致贺词。会议邀请到延边大学前校长、延边大学特聘资深教授金柄珉、中国社会科学院邢广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梁展、东北师范大学韩东育、四川大学张哲俊、上海外国语大学宋炳辉、韩国延世大学白永瑞作特邀演讲；鲁东大学亢世勇、厦门大学李无未、山东大学牛林杰、天津外国语大学姜龙范、吉林大学秦曰龙、韩国高丽大学宋浣范、延世大学赵强石、仁荷大学禹景燮、井冈山大学辛炫承作大会演讲。



本届会议为期三天，开设了特邀演讲、大会演讲、圆桌会议等交流平台，来自中国社会科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鲁东大学、韩国高丽大学、启明大学、仁荷大学、延世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7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延边大学副校长朱卫红在闭幕式上致辞。

本届会议由延边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一流学科建设项目组、外国语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文学院联合主办，延边大学东亚跨文化研究中心、文学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鲁东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共同承办。会议在世界视野和东亚视域下探讨文学、语言学、史学、哲学、文化学以及国际关系研究的现状和未来，议题设置广泛，嘉宾层级高端，务实成果丰硕，充分体现了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亚洲智慧；有利于构筑我国人文学研究的东亚范式、丰富人文学研究的东亚理论基础，进而推动国内外东亚人文学领域的共通—共鸣—共振。

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是延边大学1949年建校时的始创学科，是学校最具特色优势的学科之一。学科在1979年获批硕士学位授权点，1986年获批博士学位授权点，2002年入选国家重点学科，

2011 年获批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017 年和 2022 年先后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学科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转化、中国文化走出去、东北亚人文交流、周边外交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高校智库作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稳边兴边强边、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发展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信息来源：中国日报网站）

“东亚视域下的日本史研究” 中国日本史学会年会在长春召开

2023 年 8 月 12-13 日，中国日本史学会 2023 年年会暨“东亚视域下的日本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吉林省长春市东北师范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日本史学会主办，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东亚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院、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及多名博士研究生参加了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董灏智教授主持。东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王延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东北师范大学韩东育教授介绍了为学会的创建和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各位前辈学者，并就此次会议议题进行阐述，强调今后的日本史研究应注重从东亚视域进行多维审视与立体考察。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天津社会科学院程永明研究员主要汇报了 2022 年学会换届以来开展的各项具体工作以及学会的财务情况等。

在大会主旨报告环节，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研究员做了题为《战后日本对东亚政策综合考察》的报告，从探讨“东亚”概念出发，分三个时期，从四个角度分析了战后日本的东亚政策。中国日本史学会原副会长、北京大学宋成有教授做了题为《中国日本史研究主体性与学脉传承的再思考》的报告，通过介绍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奠基者—吴廷璆、邹有恒、周一良三位先生的日本史研究，指出研究的主体性和学脉传承对建立中国日本史研究体系的重要性。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宋志勇教授做了题为《日本十四年侵华战争与对华认识》的报告，系统梳理了近代以来日本长期形成的对华认识，指出日本错误的对华认识是其发动侵华战争的心理根源。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福建师范大学赖正维教授做了题为《琉球问题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报告，详细呈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学界琉球历史、中琉关系史研究的发展历程、

取得的成果及今后应关注的课题。

在主旨报告之后，会议分设四个议题，并相应设置四个分会场，每个分会场又分为三个小组，与会学者围绕相关议题展开了充分、热烈的交流和研讨。四个议题分别是：东亚视域下的日本史专题研究、东亚视域下各国的互动与交流、日本对世界各国的调查与研究、东亚的公共产品问题研究。会议诸多探讨展现了研究的新进展，视角宽广、资料翔实、观点上力争有所创新。

会议闭幕式由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辽宁大学王铁军教授主持。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跃斌研究员，中国日本史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艳茹研究员，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唐利国教授，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云南大学毕世鸿教授，分别就四个议题的讨论情况做了总结汇报。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浙江工商大学江静教授代表下届年会承办单位做了发言。最后，韩东育会长致闭幕词，对未来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及中国日本史学会的发展做出展望。

（信息来源：中国世界史研究网站）

《东亚经纬》征稿启事

《东亚经纬》是由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东亚研究院（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办，面向全国相关机构内部发行的学术季刊。

本刊以研究“东亚学”理论，探讨东亚地区热点问题，分析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走势，以传递海内外“东亚学”研究动态及信息为己任，积极传递海内外“东亚学”研究动态及信息，开设“观察与思考”、“名家访谈”、“学术动态”等栏目。

《东亚经纬》不仅是从事东亚研究的各界人士开展学术探讨和交流的平台，也是相关部门了解和认知“东亚学”领域重要研究成果的渠道之一。

为进一步提高《东亚经纬》信息质量和可读性，能够全面反映“东亚学”研究的现状，兹长期征集相关东亚的研究稿件。征稿要求如下：

- （1）稿件要求立意新颖，观点鲜明，内容充实，论证严密，语言精炼，资料详实；
- （2）稿件必须由作者（或合作者）完成，杜绝抄袭。字数以 2000—3000 字为宜，优秀稿件可适当放宽字数要求；
- （3）稿件中如有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际标准，尽量不用图表；
- （4）一般不使用注释，如有引文，可在引文后加括号，注明出处（按作者、文献名、期刊或出版社、年月顺序）；
- （5）附上作者简介，信息包括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联系方式等。

本刊收到稿件起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阅，并通知作者稿件处理情况。稿件一经采纳，本刊将略付薄酬。

投稿邮箱：youno2014hz@mail.zjgsu.edu.cn

邮寄地址：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正街 18 号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邮编：310018）

《东亚经纬》编辑部

